

德鲁克 经典著作书系

POST-CAPITALIST SOCIETY

后资本主义 社会

[美] 彼得·F·德鲁克 (Peter F. Drucker) 著
傅振焜 译



東方出版社

德鲁克 经典著作书系

POST-CAPITALIST SOCIETY

后资本主义 社会

[美] 彼得·F·德鲁克 (Peter F. Drucker) 著
傅振焜 译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资本主义社会 / [美] 彼得·F·德鲁克著, 傅振巍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9
ISBN 978-7-5060-3567-5

I. 后… II. 彼得… III. 傅… III. 管理学—研究—K.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02129号

Post Capitalist Society by Peter F. Drucker.
Copyright © 1993 by Peter F. Druck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Peter F. Drucker Literary Trust (LD)
through Big Arjac Ti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by Oriental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版权由大苹果公司代理
中文简体字版由彼得·F·德鲁克著作基金会授权出版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权属东方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8-4320号

后资本主义社会

作 者: [美] 彼得·F·德鲁克

译 者: 傅振巍

责任编辑: 姬利 陈涛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东方出版社 东方音像电子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智力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127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3567-5

定 价: 33.00元

发行电话: (010) 65257256 65215857 65276881

团购电话: (010) 65230533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66204

序 言

变 革

西方历史每隔几百年，就会有一次大变革。我在《管理新现实》（1989年）一书中称此为“时代分水岭”。短短几十年内，社会自行重组其世界观、价值观、社会与政治架构、技术和重要部门等。50年后，又重现了一个新世界。此时出生的新世代已无法想象过去祖父辈成长的时代面貌了。

如今我们就处于这样的变革中。这场变革孕育了“后资本主义社会”，这也是本书所要探讨的主题。

13世纪也曾发生这样的变革。当时欧洲世界一夕之间转向以新兴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方向，而由商人、工匠组成的行业公会（guild），则是新兴的社会支配团体；长途贸易复苏，而哥特式新建筑风格则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品味；锡耶纳（Sienese）画派兴起，发源于意大利中部城市，代表人物为杜乔（Duccio）；回归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运动出现；城市大学取代遁世的修道院，成为文化中心；新起的道明会与圣方济修会肩负传教、授业、解惑的使命；几十年内，但丁就舍弃拉丁文改用方言写作，从而创造了“欧洲”文学。

200年后又发生另一次大变革。从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发明活版印刷术（1455年）到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1517年）的60年中，文艺复兴运动在佛罗伦萨、威尼斯开花结果；古希腊精神重现；美洲新大陆被发现；西班牙创建步兵团，是罗马军团以来的第一支常备军；随着解剖学的重新发现，产生了科学研

究；西方世界开始广泛运用阿拉伯数字。我再强调一次，生在16世纪20年代的人，是无法想象祖、父辈以往生活的世界的。

1776年则是再下一场大变革的发端。这一年美国独立，瓦特改良蒸汽机，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自此以后到滑铁卢战役的40年中，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工业革命等现代所有的“主义”一一出笼。在这段期间，第一所现代大学创建（柏林大学，1809年），教育开始普及。犹太人势力兴起，到了1815年，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家族银行集团的“金权”已凌驾于王权之上。总之，这40年产生了新的欧洲文明。在这个时代成长的人们，根本想象不到祖、父辈以往的生活样貌。

200年后的今天，我们正处于新的大变动之中。这场变动不再局限于西方社会与西方历史。事实上，这场变动的一个基本方向即是：不会再有真正的“西方”历史或“西方”文明，只有世界历史、世界文明，但后两者都已经“西化”了。对于这场变动的起源有两种争议，一说是第一个非西方国家——日本在60年代成为世界经济强权，一说是计算机普及，使得信息成为世界运转重心。我则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施的《美国退伍军人法案》（G. I. Bill of Rights）是关键。这项法案资助退伍返乡的军人上大学，如果早30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实施的话，这种做法绝对会被视为毫无意义。这个法案本身及其对退伍军人的惠助，正是我们迈向“知识社会”的指针。未来的历史学家极可能视此为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

很明显，我们正处于变动的过程中。假如历史有指引作用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这场变动将持续到2010年或2020年，而且变动的影响力已扩及当今的政治、经济、社会与道德诸领域。20世纪90年代的人同样对其祖、父辈（例如我这一代）所生长的世界不得其解。

1455年起的变革，使西方从中世纪过渡到文艺复兴时期，进入

近代。50年后，在哥白尼的《短论》(Commentaries, 1510~1514年)、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Prince, 1513年)、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教堂天花板重现《创世纪》(1510~1522年)情景和翠登廷会议(Tridentine Council, 16世纪30年代展开)之后，天主教重建运动陆续出现，人们才了解变革的真义。

美国独立后展开的变革，也到60年后，经过托克维尔(Tocqueville)《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 1835~1840年)的出版，大家才开始分析、理解变动的含义。

在我们迈进新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进程中，想提早重新审视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时代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历史，当然言之过早。所以这本书是要用较新的角度来看待我们正在失落的年代。用较新、较有利的观点来看已存事物，可能会有令我们极度惊奇的收获。

现在就预测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未来面貌，当然是冒险之举。如果只是要知道将来会有什么新问题、症结何在，我相信我们已掌握若干可能性，也有能力描绘许多领域无法运作的情景。绝大多数情况下，事物的“答案”总要到未来才能水落石出，但我们现在就可以肯定，现有的价值、信仰、政治观、世界观、社会经济结构与体系，到未来世界时一定会重组，变化之大，非我们现代人所能想象。

目前有些基本改变已经出现，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新社会一定是后资本主义社会，其最关键的资源必是知识。这也就表明，这个新社会非是一个“组织社会”(a society of organization)不可。在政治上，我们已经从有400年之久的主权国家转变成多元政治体系，国家已不再是唯一的政治整合形态。“后资本主义政体”是跨国、跨区域、跨地方的政治单元，而且在体系中相互竞争。这些现象都已经发生了，所以才能加以描述，这也正是本书的目的。

后资本主义社会与“受雇的经营者”当家

资本主义社会向来由两大阶级主导，一个是拥有并控制生产资

料的资本家，另一个则是工人，马克思称后者为被剥削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转变成收入丰厚的中产阶级，是“生产力革命”后的事。生产力革命兴起于马克思逝世时（1883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于发达国家达到巅峰。20世纪50年代，发达国家中的制造业工人似乎已控制了政治与社会，但随之而来的“管理革命”，却使制造业的蓝领工人数量、权力急剧下降。到了2000年，发达国家的传统工人，占该国总劳动力的比例估计不会超过1/6，甚至不到1/8。

资本家的权势发展可能比工人更早，大约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之际，最晚不会超过一次世界大战。从那时起，资本家的权力与威望无人能匹敌，最著名者有美国的摩根、洛克菲勒、卡内基、福特；德国的西门子、蒂森（Thyssen）、拉特瑙（Rathenau）、克虏伯（Krupp）；英国的孟德（Mond）、古纳德（Cunard）、利瓦伊（Lever）、维克斯（Vickers）、阿姆斯特朗；法国的文德（de Wendel）、史耐德；日本的大财阀家族如三菱、三井、住友等。

到了二次世界大战，经由管理革命，这些资本家被“专业经理人”所取代。当然，现在很多资本家仍活跃于报纸的社会版面，但他们已经成为“社交名人”，几乎不再插手经济事务了。在商业新闻中，焦点都在“受雇的经营者”（hired hands）身上；如果提到钱，指的大多是经理人的薪水、红利，而不是资金的问题。

在发达国家，退休基金已取代旧式的资金形式，逐渐控制资金的供给与分配。以美国来说，1992年，退休基金拥有美国大企业一半的股份以及几乎相同比例的固定债务。退休基金的受益人是美国企业的员工，假如社会主义正如马克思说的，是由受雇者掌握生产工具，那么美国可成了最社会主义的国家了。但另一方面，美国却又是最资本主义的国家，退休基金是由“新式资本家”，亦即数量庞大的薪水阶级所经营管理的，他们是这些退休基金的投资分析师与资产经理人。

此外，在新社会真正支配性的资源、绝对决定性的生产要素，

既不是资本、土地，也不是劳动力，而是知识。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主导阶级不是资本家，而是“知识工作者”与“服务工作者”。

向知识社会的转变

后资本主义社会在二次大战后兴起。我初次关心“受雇者社会”（employee society）的议题，刚好是在1950年之前。大约10年后，我创造出“知识工作”（knowledge work）与“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的新词。1969年，我在《断层时代》中首次提到“组织社会”的概念。因此本书的写作基础有40多年的工夫，而我所建议的策略方案，也多被证实有效。

但是，一直等到20世纪90年代，我们才完全明白，原来我们早已进入一种不同的新社会。一直到此时，这本书才成为可能。这本书不是预测，而是描述性的；这本书不空想未来，而是呼吁立即行动。

前苏联政权的崩解，不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ayama）所宣称的“历史之终结”。即使最信奉自由市场的人士，也不太肯定自己阵营的胜利就代表历史千禧年已经到了。1989年到1990年的一连串事件，不仅代表某个时代的结束，也代表250年来“现世宗教”历史发展的结束（我称其为“社会救赎信仰”）。这种现世宗教由卢梭（1721~1778年）开启，而乌托邦正是其终极与神话的形式。

然而，摧毁前苏联的力量，也同样淘汰了资本主义。从18世纪上半叶起，资本主义支配社会现实达250年之久。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则是优势性的社会意识形态。但另一种新社会已经快速出现了。

这种社会就是已经出现的后资本主义社会。我得再强调一次，新社会必定以自由市场作为统领经济的唯一机制，一定不会是“反”资本主义社会，更不会是“非”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组织机

构一定会继续存在，只是其中某些单元（如银行等）可能会扮演相当不同的角色。不过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心，比如社会结构、经济动态、阶级等，都将与过去 250 年来的取向有所不同。

后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经济资源，不再是资本或自然资源，也不再是劳动力。无论现在或未来，最关键的经济资源一定是“知识”。创造财富的活动，不在于筹谋生产所需的资本，也不在于劳动力的付出，所有价值的创造都由“生产力”与“创新”来创造，这两者都是运用知识于工作之上。这种以知识为主的社会，其领导团体一定是“知识工作者”，也就是懂得如何用知识从事生产的经理人，这跟资本家运用资本从事生产的道理相同。

知识工作者也是知识性的受雇者，实际上，所有这些知识人在组织中一定是受雇的，但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受雇者不同，知识工作者既拥有“生产资料”（the means of productions），又拥有“生产工具”（the tools of productions）。说他们拥有“生产资料”，是因为他们能通过退休基金制度成为真正的拥有者；说他们拥有“生产工具”，是因为这些知识工作者走到哪里，都可以带着知识走。所以后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方面的挑战，一定是知识工作与知识工作者生产力的问题。

后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方面的挑战，必然会是服务工作者的尊严问题。一般而言，服务工作者缺乏成为知识工作者的养成教育。但每个国家，甚至是最先进的国家，服务工作者都将是社会中的多数。

价值与审美上的某种新对立，会造成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裂。这种对立不像斯诺（C. P. Snow）在《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书中所说的人文和科学的对立，而是“知识人”（intellectual）与“经理人”（manager）之间的对立，前者着重知识与理念，后者看重人际与工作。因此，后资本主义社会哲学与教育上的重大挑战，就是要消解这种对立以产生新的整合。

民族国家再见吗

如果 1989 年柏林墙倒塌，象征冷战的结束，那么 1991 年 2 月多国联军制裁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就象征着 400 年来在政治舞台扮演主角的“主权国家”（sovereign nation）已经终结。这种多国联合行动是前所未见的，未来的历史学家必然会将此划入历史大事记。在此之前，大家几乎都反对各国为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搁下本国人民的情感或利益，去打击恐怖主义。现在大家却都同意，反恐怖主义不是单一政府的事，需要跨国行动。

很多人相信（特别是美国的自由派人士），1991 年制裁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主要是保护西方国家的石油命脉。这种看法与事实差矣。就经济上来讲，一旦伊拉克控制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的油田，对西方国家反而有利——石油价格会便宜很多。因为科威特与沙特阿拉伯人口不多，并不那么依赖石油出口的收入。而伊拉克是人口过剩的国家，除了石油，几无其他天然资源。所以科威特与沙特阿拉伯希望抬高石油价格，减少产量，而伊拉克则需要尽可能出售更多石油，后者会使国际油价下跌。这可以说明为何美国一直大力支持萨达姆政权，直到他攻击科威特，展开恐怖行动为止。我以为，这也是萨达姆失算之处，他必然深信美国会姑息他出兵科威特，以保油价的低水平。即使在西方，我所认识的一家大型石油公司的人，也都认为美国只会对两伊战事叫嚣，不至于出兵干预。

16 世纪法国的法律政治学家博丹（Jean Bodin）首度提出“民族国家”的理念，在往后 400 年中，无论对内或对外，民族国家都成为唯一的政治权力机关。后 200 年里，亦即从法国大革命起，民族国家成为现世宗教的承继者，肩负解救社会的使命。事实上，将主权国家视为至高无上权力机关的概念，无限制地推演到最后，就变成了极权主义（纳粹就是如此）。

目前政治学理论和宪法仍体现主权国家的理念。在过去 100 年中，主权国家的权力与影响力愈来愈大，最后转变成“万能国家”。这也是目前为止我们所熟知的政治结构。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起，近 200 个脱离殖民地国统治的新兴国家，都高举主权国家的大旗，直到前苏联瓦解，原加盟共和国也还是希望成为主权国家。

但是这 40 年来，主权国家逐渐在丧失其作为唯一权力机关的地位。以内在环境而言，发达国家正快速转变为多元的组织社会；从外在环境来看，许多有别于国家范畴的政治机关不断出现，有些是跨国的，有些是区域性的（如欧盟），另有些是地方性的。

民族国家并不会走向灭亡。在未来极长的一段时间内，民族国家仍旧会是最有权力的政治机关，只是不如以往一样，有绝对唯一的地位，它必须逐渐分出权力给其他的组织机关与决策者。所以我们的问题是：民族国家会分出哪些权力来？哪些机能会变成“超国家的”（supernational）？哪些会变成“跨国家的”（transnational）？哪些又会变成“地方性的”？

这些问题会是未来几十年中政治课题的核心。过去的政治戏幕中，每个演员的大小、财富、宪政结构、政治信仰各有不同，但全都披上民族国家的外衣，每个人在领地范围内部声称拥有主权。现在的几个例子虽不足以预测未来，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政治秩序肯定会跟以往的世纪不同。

所谓“前现代”哲学家中的最后一人莱布尼兹（Gottfried Leibniz, 1646—1716）花费了大量时光想要重整基督教王国的统一，但结果却是徒劳的。他并不担心基督新教与旧教的，或新教不同派别的宗教战争，他只担忧一般人的信仰会丧失超自然的神，如此，现世宗教就会出现。而他深信，依照定义推论，现世宗教必然会演变成一种专制统治。

一个世纪后，卢梭证实了莱布尼兹的忧虑。卢梭认为，社会能

够、也应该指导个人；社会能够、也应该创造“新亚当”；社会能够、也应该创造人类的普遍理想。但是，社会同时也能够、且应该让个人服从于超越个人的“普遍意愿”（general will），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客观历史法则”。从法国大革命起，社会救赎在西方社会逐渐成为有力的信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遍及全世界。不论这种概念怎样装扮“反宗教”的外衣，骨子里仍然是一种宗教信仰。当然，其手段是非宗教性的：禁酒、屠杀犹太人、崇尚泛精神分析学而非真主、废除私有财产等，但其目的却是宗教性的，是要创造“新人类”，从而建立现世王国。

苏联之所以崩解，是因为其经济体制产生了贫穷，而不是富裕，为官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特权，而非经济公平，还因为其思想教条不但未创造出“新人类”，反而暴露了“旧亚当”的腐败。

人类很可能毫无救赎的希望。以前有个拉丁诗人可能说得对：“人性往往前门进，后门出。”意指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或许犬儒者说得对：人性没有美德、至善、公正，只有自私自利和伪善。

但可以肯定的是，社会救赎信仰终结之后，我们无法得知未来会出现何种信仰，只能等待。但除了听天由命之外，难道别无其他吗？说不定会有传统宗教复兴，致力解决知识社会中个人的需求与问题。现在美国不断激增的莫名教派与聚会就是一个象征。伊斯兰世界的年轻一辈，现在都狂热信奉基本教义，如果退到40年前，他们应该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

预测未来不可能发生的事，比预测可能发生的事要容易得多。正如日本畅销书作家堺屋太一（Taichi Sakaya）在《知识-价值的革命》中所预测的：在未来，我们看不到对物质与科技的抗拒，听不到“回归中世纪”的呼吁。信息与科技的全球扩散，支持这种预测的可能性。（不过堺屋太一对中世纪是反物质的假设，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中世纪的人渴望拥有，欲望掩盖信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曾嘲讽，十字军东征其实是史上最庞大的采购旅行。中世纪之所以贫

穷，并不是当时人自愿选择的，而是穆斯林征服了西亚与地中海世界，切断了他们通往希腊的财富之路。)

社会救赎信仰的终结，必然代表一种内在精神的转折。救赎、重生、升华、至善、德行很可能被视为纯属个人存在之事，而不是社会目标与政治规范。这重新强调了个人人格，还可能引领我们回归个人责任。

起码我们可以这样企望。

第三世界的潜力

本书的焦点是发达国家及地区，如欧洲、美国、加拿大、日本等，而不是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我当然不会以为后者无足轻重。第三世界的人口已占全球 2/3，到这场大变动的末期，可能会占 3/4。不过，我也认为，往后一二十年内，一定会有新的“经济奇迹”出现，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很可能短期内就会成为经济强权，其变动甚至比过去 40 年还大。现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已展现这种经济潜力。中国有广大的国内市场，有受过良好教育、学习心强烈的人民，有悠久的代工传统，还有来自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的资本、贸易网与技术管理人才。如果这些条件得以发挥，就能促使工业成长。

拉丁美洲若干较大国家也有广大的国内市场，墨西哥可能已在起飞阶段，而巴西一旦鼓起政治勇气，仿效墨西哥最近成功的例子，那将来的成就可能会震惊世界。至于东欧国家会有什么惊人表现，更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

虽然本书的重点在发达国家，但跟第三世界有密切的利害关系。要是第三世界不能快速发展，一定会有大批人潮涌向发达国家，超乎这些国家经济、社会、文化所能负载的程度，结果就会发生人间惨剧。

但是创造后资本主义社会与后资本主义政体的动力，还是源自

发达国家。后资本主义是发达世界发展后的结果。五六十年代的第三世界领袖，如尼赫鲁、铁托等，都曾向人民保证，第三世界会找出不同的新答案，创造新的秩序，这些保证到现在都未兑现。所以后资本主义社会与政体的挑战、机会与问题，只能从其起源处着手——也就是发达世界。

行动的时刻：社会和知识

本书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讨论的议题有后资本主义社会、政体，还包括知识本身的新挑战。本书不是一本“未来的历史”，它着眼的是“现在”。

本书的三大议题：后资本主义社会、政体与知识，是依其“可预知性”而顺序排列的。关于后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已知道发生了什么，及为什么发生，也知道即将发生何事及其理由（即使不够透彻，也已经有了线索）。至于后资本主义政体，目前我们只知其轮廓，至于该如何填色补缝，仍只能靠想象，但大致可以回答若干问题。而关于知识方面的挑战，我们却只能提出一些问题，并且希望这些问题是正确的。

我经常问自己，我到底是乐观的人，还是悲观的人？对于20世纪的幸存者来说，说自己是乐观主义者，那肯定是个白痴。我敢说，我们想远离动乱的路途仍然遥远，而种种的变乱已使20世纪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残暴的世代。宣称“历史之终结”已近的人，是在自我欺骗。比如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曾因此押宝在戈尔巴乔夫身上，然后又改成叶利钦。这种情况一定让他们极为困扰，不知何时才算是“历史之终结”。

可称为“后”的时代是转型期，所以不会长久。我们的社会就处于转型期中。未来的社会是什么样子（姑不论未来是否就是我们憧憬的“知识社会”），要看发达国家如何响应这段转型期的挑战。

这要靠知识领袖、企业领袖、政治领袖的智慧，更重要的，还要靠每个人的行动。尽管未来尚不明朗，但我们可以肯定，现在正是**创造未来**的时刻；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而现在正是行动的时刻。

彼得·F·德鲁克

后资本主义社会已来临

没有一个国家会在同一个时期历经由农业、工业、商业现代化到企业现代化的历程，这就如同一个孩童误闯入了一个全新的国度，不小心坐上了云霄飞车后，已不知自己身处何时、何处，自己是谁，又将何去何从，对于未来既充满了期待，却又怕被伤害，心中五味杂陈。

谁能料想到北京能主办四年一度的奥运会，不论是参赛国家的数量还是各国领袖的参与人数，都是史上最多的一次。更重要的是，中国代表队首度登上金牌榜首位，刷新了历史纪录，中国成为世界的“体育王国”，一洗百年来的“东亚病夫”之国耻。

然而，激情过后留下的是什么？是世界级的罕见建筑创作（如鸟巢、水立方）？还是中华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水立方已变成了水上音乐会的圣地。鸟巢又将有怎样的功能创新？我们拭目以待。

谁也没有想到，奥运会刚过，华尔街金融风暴、全球经济危机紧接着就持续蔓延开来，中国也无法幸免。但是中国政府闪电般推出的药方，不但暂时止住了通货紧缩的恶化，也挽留住了一些国内外投资者，使得2009年的“保八”（8%）变得有可能实现。

后资本主义社会与知识

世界的未来社会肯定是“后资本主义社会”，其中真正的关键资源便是“知识”。由于知识无国界，因而不再会有纯粹的“西方历史”、“西方文明”和“西方知识”，只有“世界历史”、“世界文明”

和“世界知识”，但后三者都已经西化了。日本就是一个极为明显的例证，新加坡、中国台湾等也不例外。

然而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的主导阶级不再是资本家，也不是无产阶级，而是“知识工作者与服务工作者”。也就是说，后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经济资源，不再是资本或自然资源，也不再是劳动力。无论现在或未来，最关键的资源必定是“知识”。任何创造财富的活动，不在于如何筹措资本，也不在于劳动力的付出，所有的价值都由生产力和创新来创造，而生产力的高低和创新的成败都与知识的应用和跟工作的结合有着密切关系。

在这种以知识为主的社会，其领导团体一定是“知识工作者”。

知识工作者既拥有“生产资料”，又拥有“生产工具”。所谓拥有“生产资料”，在美国是因为他们能通过退休金制度成为真正的拥有者、真正的资本家。所谓拥有“生产工具”，是因为这些知识工作者走到哪里，都可以带着知识走。所以后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方面的挑战，一定是知识工作与知识工作者生产力的问题。

原本贫穷的中国，由于邓小平的开放策略，在短短二三十年间就使得经济得到巨大发展，其变化之大较过去数百年、数千年更甚。如今中国的沿海地区已展现了巨大的经济潜力。中国有庞大的国内市场，有受过高等教育、勤奋好学的知识工作者，有悠久的代工传统，还有来自中国台湾、新加坡、美国等地的华人社会的资本、贸易网络、科技人才与管理者，加上全球跨国公司的知识、人才、资金的不断投入，这些都使得中国成为新兴的经济发展国家，其2008年的外汇储备已近20000亿美元，遥遥领先于第二名的日本。

知识与智慧究竟有何不同？其中最大的差异在于，单单拥有知识不足以完成任何事。我有一位要好的朋友，他立志一生要取得10个博士学位，如今年过六旬，已取得了6个博士学位，他什么事也没做，成天读书，也不工作，他唯一的“工作”就是读书，读书原本是手段，在他那里却变成了目的。知识只是工具而已，要能善用